

文人情怀与寒士生涯的融合与碰撞

——《聊斋志异·黄英》解读

黄心如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9日

摘要

本篇论文以《聊斋志异·黄英》为研究对象, 结合蒲松龄的文人经历, 分为三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探讨其笔下文人情怀与寒士生涯的融合碰撞: 科举的失意, 使得他无法改变当前的处境; 家境的贫困, 他不得不于乡间设帐坐馆以维持生计; 社会地位的卑下, 使得他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第二部分, 他在《聊斋志异》的《黄英》故事中寄托了广大寒士的共同追求和愿望, 即如花美眷、万贯家财、得遇知音和理想追求等。第三部分即对传统菊花文化的创新解读。

关键词

《聊斋志异》, 蒲松龄, 黄英

The Fusion and Collision of Literati Sentiment and Lower Literati Career

—Interpretation of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Huang Ying”

Xinru Hu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8, 2026; accepted: April 1, 2026; published: April 9,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Huang Ying” from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Pu Songling’s experiences as a schola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and collision of his scholarly sentiments and the life of a poor scholar: his failur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prevented him from changing his current situation; his poor

family circumstances forced him to teach in the countryside to make a living; and his low social status prevented him from receiving due respect.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how he expressed the common pursuits and aspirations of many poor scholars in the story “Huang Ying” of “Strange Tal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such as a beautiful wife, vast wealth, finding a soulmate, and pursuing ideals. The third part is an inno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hrysanthemum culture.

Keywords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 Pu Songling, Huang Y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文学是苦闷的象征”。现实中生命受压迫而却难以改变时，现实的苦闷便可通过文学来发泄。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正是一本孤愤之书。作者描写了一个狐鬼花妖的世界。文学来源于生活，在故事中男主角一般是寒士，蒲松龄正是传统儒家寒士的代表，蒲松龄对寒士的生活最为熟悉，描写也极为深刻，是自己的生活体验的折射。蒲松龄作为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人，一生都在科举中，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发奋读书，一举拿下秀才，但是乡试却屡战屡败。在积极的入世思想和艰难的现实处境下。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这本书寄托寒士阶层的文人追求。在黄英的故事之中则可概括为如花美眷、家财万贯、得遇知音和理想追求等。描写了三个分明的人物形象，即隐逸情怀的清高淡泊却不免迂腐的马才子、怀有诗酒情怀的豪放通达、洒脱热情的陶生以及温文尔雅、从容淡定的黄英。而在黄英这个故事之中，蒲松龄对传统的菊花文化进行了一个扩展。菊花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发展的。在传统的隐逸情怀之上，肯定了物欲。在高雅和世俗两个方面不断发展菊花文化。

2. 蒲松龄的寒士生涯和文人情怀

2.1. 蒲松龄的寒士生涯

蒲松龄的家庭是一个当地世家，虽说是世家，但是存在的时间相对其他世家来说较短。蒲姓是由居住在中国的阿拉伯人根据居住国的习俗改变姓氏而出现的。蒲姓家族之中没有过什么著名的人物。在整个明代，只有蒲盘父亲的堂兄弟蒲生汶中了进士，当过县官，但很早就去世了。这就是家族中最出名的了。自蒲生汶“应考美谈”出现之后，在家族之中则是出现了勤奋好学的风气，蒲盘从孩童时期就用功读书。可是他没有读书的才能，也没有生汶那么努力，成绩自然达不到中举的水平，连考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由于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对科举的追求，弃儒经商去了。但是却子嗣艰难。中年得子后，他便将自己未实现的科举之梦寄托在儿子的身上。至此，便是蒲松龄所在家族的大致发展情况。

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的蒲松龄离开家乡来到淄川，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功，成为当时少见的秀才，蒲松龄怀着喜悦之情衣锦还乡。但是在此之后，蒲松龄却频频落榜。为了维持生计，蒲松龄在民间设帐坐馆。但是蒲松龄没有放弃通过科举入仕的想法，怀揣着强烈的入世意识，他一边学习八股文，一边创作小曲和小说。在科举之路挣扎了数十年之后，终于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岁贡。但却是虚名。蒲松龄的科举之路就此落下帷幕。回顾蒲松龄的一生，他在《戒应酬文》中如此写道：“弯月已西，严寒侵烛，霜气入帟，瘦肌起粟，枵腹鸣饥，回顾酸影在墙，须吻张翥，耸肩缩项，如世钟馗。”

([1], p. 44)将一个家道中落、失意不得志的文人形象展现于纸上。他反复审视自我, 审视社会, 终写出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聊斋志异》。可谓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 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政治上, 蒲松龄是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寒士而出现, 他对科举功名不懈追求, 希望通过科举来实现自己治国理想和衣锦还乡的愿望。但是不幸的是, 蒲松龄在科举的一次成功之后便没有再次中举。以自身的科举经历为依据,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作了多种文人形象, 其中有热心科举并成功获得功名的书生, 有受科举不公的落魄士人, 也有安贫乐道的清贫士人等。不过蒲松龄小说创作不仅仅在民间流传, 更是传入了考官的耳中。小说中蕴含的对科举的思考与批评对蒲松龄的科举之路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阻碍。经济上, 蒲松龄的寒士之寒还表现为维持家计之难。政治和经济自古便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士人对科举功名的追求也包含着衣锦还乡、荣华富贵的追求。“由此看来, 士人对于科举功名的追求, 固然有步入仕途, 实现自己治国理想的成分, 但也未尝没有包含着借此享受荣华富贵, 光耀门楣的世俗内容。”([2], p. 12)当长期入仕无门时, 经济问题也随之出现。书不能代替衣食住行, 只有在经济相对富足的情况下, 才能无后顾之忧去走科举之路。但是分家之后, 家境窘迫, 蒲松龄只有在市井之中做教书先生维持生计。社会地位上,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统治阶级政策的变化, “士”的地位在不断的下降。无钱无权的生活让蒲松龄备受冷落。甚至在婚姻问题上, 也处于一个尴尬处境。因此, 在《聊斋志异》之中不乏有描写圆满的婚姻爱情故事。蒲松龄在文学作品之中借狐鬼花妖的故事来排解自己在现实生活之中的愁绪, 在《聊斋志异》之中有如花美眷来疏解愁绪, 甚至帮助书生考取功名等。

在有着“诗言志”之说的中国古代社会, 文学作品通常是作者的第二个化身。作品和作者的家世、经历、思想、理想等有着不少的联系。“在他身上, 既有出身书香世家, 追求功名、结社交游的正统文人之风, 也有扎根乡村、饱受民间疾苦的凡俗一面。”([3], p. 14)作者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我的感受和经历, 并且试图引起读者共情, 和读者产生共鸣。《聊斋志异》便是以传奇法, 表当下志的一部孤愤之书。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是描写富有传奇色彩的狐鬼花妖的故事, 蒲松龄通过这本书展示了当时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以及科举考场的黑暗。寒门子弟难以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也集中反映了蒲松龄以及同时代广大寒士在自我的文人情怀和寒士生涯的融合和碰撞之下产生的共同心声, 即对科举进第、富足经济、美眷在怀等愿望的追求。蒲松龄将自己的寒士生活作为底本, 通过这些艺术形象表达了他对个人理想的追求以及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这样的寒士生活不是蒲松龄独有, 他所描写的是整个寒士阶层的困境, 表达了寒士阶层的共同追求。

2.2. 蒲松龄的文人情怀

自古以来, 文人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发展后, 文人群体根据自身的身世经历等产生了多样化的文化自信、文人情怀。这些文人情怀也具有一些共通之处, 形成了一些典型的文人情怀。例如济世情怀, 家国情怀, 山水情怀, 落魄情怀, 隐逸情怀, 悲秋情怀, 诗酒情怀, 忧患情怀等等。其中, 蒲松龄较为突出的有儒家情怀、隐逸情怀等。

首先, 占据主流的还是蒲松龄的儒士情怀。虽然蒲松龄受到了儒、释、道等多家思想的影响, 但是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受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要求, 提出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主张。自此, 儒家思想成为涉及政治和伦理学说的正统思想。其核心理念包括仁、义、礼、智、信等多方面。在之后两千年的历史之中, 儒家思想对广大文人的思想、心理甚至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蒲松龄正是这么一位受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影响的文人。济世情怀和家国情怀蒲松龄的思想和人生选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科举的不懈追求。

再来便是蒲松龄的隐逸情怀。蒲松龄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科举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方式。但是科举的失败, 家境的穷困潦倒, 生命的有限等都造成了蒲松龄内心的压抑。为了释放心中的苦闷, 蒲松龄

便转向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回归自然本真自我。在不少的故事里他表现出自己的出世情怀以及陶渊明情结。《聊斋志异》之中的黄英篇中的陶氏姐弟便是陶渊明的化身，纵情诗酒，来于自然，还于自然。在《黄英》篇之中，蒲松龄描写了三个分明的人物形象，即具有隐逸情怀的清高淡泊却不免迂腐的马才子、怀有诗酒情怀的豪放通达、洒脱热情的陶生以及温文尔雅、从容淡定的黄英。而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蒲松龄文人情怀和寒士生涯融合碰撞之下所寄托的文人愿望。

3. 时代新变下的文人追求

在蒲松龄的《黄英》篇中，蒲松龄将自己寒士生涯的经历和文人情怀结合，描写了一个所讲述的就是一位爱菊如命的儒生和两位菊花妖因为菊花相识相知，因为卖菊观念不同而又发生冲突，最后又重归于好的故事。古人言，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等。蒲松龄的愿望在黄英的故事之中则可概括为如花美眷、家财万贯、得遇知音和理想追求等。

3.1. 如花美眷

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情的追求也不再被严格禁锢。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汤显祖提出了至情论，写出了《牡丹亭》这部人间至情之作。情，开始为人们所追求，蒲松龄也肯定了追求情的合理性。在黄英篇中便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通过作者对黄英和马才子之间的婚姻爱情描写可以看出文人们对圆满婚姻爱情的追求与向往。

花妖在蒲松龄笔下较为常见，黄英便是菊花妖的化身。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花妖通常是真善美的化身，给人积极的情绪价值。在黄英的故事之中，黄英在故事前期基本未提及，一直到成婚之后，黄英的形象才渐渐丰满起来。作者先是对黄英的外貌进行粗略描写，介绍黄英的性情温良。此时黄英的人物形象还较为单薄。但是在马才子妻子去世之后，黄英的人物形象逐渐丰满起来。蒲松龄通过对神态和行为举止的描写出黄英的大家闺秀之风。

在《聊斋志异》的《黄英》中对黄英的外貌描写是“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绝世美人，满足了一般人对美的外在追求。在持家之上，黄英厨艺精湛，文中如是写到：“俄献佳肴，烹饪良精”。对内，黄英符合了传统社会之中妻子应该精于厨艺的看法。在行事风格之上，在马才子求取续弦询问黄英意愿时，“黄英微笑，意似允许，惟专候陶归而已”。不急不躁，大方从容。而在陶三郎迟迟未归之时也没有焦虑急躁，平静从容地打理着家中的事务，发展着种菊事业。“黄英课仆种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贾，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甲第益壮”，展现出了一个大方得体、冷静从容的大家之风范。在陶三郎回来之后，谈论嫁娶之时，黄英考虑到马才子的家庭状况，“英辞不受采”，拒绝了聘礼。体现出细心体贴的一面。哪怕在故事最后，马才子误杀陶三郎时，黄英悲痛欲绝也没有对马才子心生恨意。

蒲松龄通过外貌、内务、行事等方面塑造出了一个端方大方、宜室宜家的女性形象。但是，在这个看似温柔顺从的女性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描绘的不同的一面，体现出墨家实干家的一面。她符合男人理想女性的各种条件，但是她有着自己的思想，有着自己的坚持，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不会盲目顺从丈夫的意愿，甘愿受教。这些性格特点主要是从婚后二人交流之中表现出来的。是蒲松龄笔下不依附于男人，有着自己独立思考，经济独立甚至可以在经济上可以支撑丈夫的一位理想女性。

3.2. 家财万贯

在故事中，主要是通过对陶氏姐弟形象塑造来表达作者对家财万贯的愿望。陶三郎是花妖形象中少有的男性花妖。作者先通过“跨蹇从油碧车，丰姿洒落”展现陶三郎的卓越风姿，再通过二人之间的言语对话塑造出儒商的形象。

文中对陶三郎的初步描写是“丰姿洒落”的翩翩公子的形象。“渐近与语，少年自言：‘陶姓。’谈言骚雅”。可以和马才子相谈甚欢，说明陶三郎是具有一定的文学功底，有着不错的人格魅力。在二人的交往之中，“陶饮素豪，从不见其沉醉”，可见陶三郎生性豪迈风流。一个风姿卓越，有着六朝名士之风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和好友每日把酒言欢的日子也需要物质来支撑。“然家清贫，陶日与马共饮食，而察其家似不举火”，马才子的家底却也并不丰厚，依附于马才子的生活无法长时间维系，陶三郎对生活也是有着美好追求。“认为‘好义’之外‘好财’也是一个人正当合理的要求，要敢于发财，同时也要靠正当经营发财。”([4], p. 50)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之下，“为今计，卖菊亦足谋生”，蒲松龄要着重展示的，是陶三郎作为儒商的一面。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并不反对在合理的方式之下，在道德的范围内，去追求物质财富，而家财万贯也是不少文人的共同追求，济世情怀之中也包含了对富足经济的追求。但是儒家是一个十分注重义利关系的学派，儒家文人重义轻利，特别反对见利忘义。因此对商人的态度是鄙夷的，形成了重农抑商的观念。而菊花，在文人眼中是不被世俗染指的花卉，在安贫的马才子的眼中，怎么能成为一个商人谋求利益的手段呢。马才子认为这是玷污了菊花。由此，传统的士商观念冲突展现在我们面前。

明清以来，商品经济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芽。商人的地位较之前有所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商业。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儒家思想对追逐利益这种行为仍然存在一些偏见，而蒲松龄则是通过陶三郎的这个花妖形象表达了自己对文人从商的看法。在《蒲松龄集》中，存在着相关看法。在《清韵居记》中，作者写道：“清不必离尘绝俗也，一无染著即为清；韵不必操缦安弦也，饶有余致则为韵。”([5], p. 147)真正的清不用远离世俗，对陶三郎、蒲松龄而言，黄花存于心中才是对菊花精神真正的传承。正如陶渊明所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自古文人重视的是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建构，是不管世俗如何发展都坚守自己的内心。

在隐逸情怀和自己困窘的寒士生涯的矛盾中，马才子毅然决然选择安贫，显示出清高淡泊的一面。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科举已经不再成为文人的唯一出路，失意文人在放下了自己的科举之念之后，也能在民间自谋出路。陶三郎便是蒲松龄寄托着富足生活愿望的男性形象。陶三郎的身上有着蒲松龄认可的魏晋六朝时期文人的隐逸情怀，同时也有着出色的经商才能。对从商，陶三郎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靠自己的能力得来的财富不是贪欲的表现，将贩卖菊花作为谋生的事业并不俗。在决定了通过菊花发家致富之后，陶三郎用马才子家中丢弃的残枝劣种培育出了优质菊花，“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不论是从品质还是种类而言，都是处于菊花市场上流。用较低的成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车载肩负，道相属也”，菊花也得到了一波宣传。单在一处售卖是远远不够的。在生意冷淡之时，陶三郎敢于走出去，“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载数车而去”。“于都中设花肆”，扩大了菊花的客源。但是菊花在来年就会变为劣种，人们不得不再来陶三郎处购买菊花新种。在此基础之上，陶三郎还注重在外寻找新的菊花品种，以此避免审美疲劳。“逾岁，春将半，始载南中异卉而归”由此可见，陶三郎也是一位具有智慧的商人。陶三郎爱财，也取之有道，有着科学合理的经营之道。种种经商手段，可见陶三郎出色的才能，但是在显示出自己的才能后，陶三郎纵情诗酒，淡泊名利，回归田园。富足生活的愿望和隐逸的情怀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3.3. 东篱风雅

在科举之路难行的情况下，蒲松龄向道家思想求得解脱。在黄英篇则是塑造了马才子这一个传统的安贫乐道的文人形象。通过马才子寄托自己对于东篱风雅的追求，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蒲松龄放置在他身上的清高淡泊但是却不免有些迂腐的特征。

马才子爱菊，已经近乎痴迷，这一点和蒲松龄有着相似之处。“他常常用‘痴’来表达某种不舍心

机，迥决世俗的天真烂漫之情。”([2], p. 21)蒲松龄在文章开头就描写了一位爱菊成痴的儒者形象。“‘癖’，亦可解释为‘兴趣’，它是指一旦人对某种事物产生了兴趣，便乐此不疲，入迷着魔似的，性命以之，成为难以改易的癖性，‘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因此它可视为是‘痴’的另一表现形式。蒲松龄笔下的寒士也大多有殊癖，它并不是故作诳诞，而是天真性格的自然流露。”([2], pp. 22-23)马才子为了得到好的菊花种子绝不吝惜金钱和精力。听说表亲有了一二种北方没有的菊花种，不惜千里也即可出发。“客多方为之营求，得两芽，裹藏如宝”，可见其对菊花之痴。菊花对马才子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一种价值追求。菊花，作为中国最为古老的花种，菊花被赋予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屈原《离骚》的出现，菊花被文人赋予了象征含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通过比兴手法，借用了木兰、秋菊来比喻君子的高洁品行，表达自己不与当时权贵同流合污的志向。至此，菊花，这一个古老的花卉品种被赋予了人格的高尚含义。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发展，菊花的象征意义在屈原、陶渊明等人手中不断发展，而经过总结我们不难发现，菊花这个意象在文人世界之中多是以一个高洁孤高、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遗世独立的独立隐士意象存在。而马才子正是这么一个有着蒲松龄情结的文人形象，蒲松龄在黄英的故事之中为马才子赋予了菊花一般的隐逸情怀。安于贫困，不为名利所驱使，和自然亲近，坚守自己的高洁情怀。

马才子正是这么一个有着高洁情怀，安于贫困的男主人公。住所之处虽宽广但是却简陋，马才子和陶氏姐弟相遇之时，面对陶氏姐弟的难处，“仆虽固贫，茅庐可以寄榻。不嫌荒陋，无烦他适”，展现出了为人清贫却乐善好施的一面。在与陶三郎的交往中，为陶三郎的六朝遗士的才华和性情所吸引，将他视为如陶渊明一般的人物。和陶三郎把酒言欢，让马才子体会到人逢知音的喜悦。在广阔的土地上，有菊花以寄托自己的隐逸情怀，有好友可把酒言欢，不为名利驱使，可发现其安贫、淡泊名利的特性。而这些正是蒲松龄在现实生活之中无法疏解的苦闷与愁绪，通过文学创作，蒲松龄找到了自我疏解的方法，展现了自己对东篱风雅愿望的追求。

但是在马才子和黄英姐弟交往的过程之中，我们也能看见他性格之中的迂腐的一面。马才子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人形象，他固守君子固穷的看法，马才子认为将高洁的菊花作为一种谋取的钱财手段是侮辱了菊花。马才子娶黄英为妻后，在婚后对使用黄英贩卖菊花的钱财为耻，认为自己的几十年的清誉被黄英拖累，他说“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但是在黄英的嘲讽之下，也做不出可以改变现状的行为，“马亦自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6], pp. 50-52)君子不追求充足的食物，安逸的居室，却能在简陋的环境之中可以安于自己的内心，保持自己的高尚的品行。“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7], p. 110)此为安贫乐道。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历史的发展之中内涵不断被丰富，蒲松龄儒家的情怀和寒士生涯在时代新变之下，体现出新的内涵。“借陶氏姐弟对以马才子为代表的传统士人进行颠覆性的批判，打破了儒家传统思想规范，肯定了物欲是士人得适其志的前提，也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文人雅士创造了新的人格内涵。”([8], p. 73)

4. 蒲松龄对菊花文化的新解

菊花是我国非常古老的一个花卉品种，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菊花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而菊花通常被文人赋予了隐逸之情怀，蒲松龄爱菊正如黄英故事之中的马才子，并且，蒲松龄还秉持一份“陶渊明”情结。

最早将菊花拉入文学世界的是屈原，“随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社会化，自然中的一些植物与人的生命活动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由自然物象成为寄寓人类情感的意象。”([9], p. 59)屈原在《离骚》中将菊花同自己的高尚品德结合起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菊花开始作为美好、高洁品德的

象征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道教和人们长寿的观念的影响和陶渊明的发扬，菊花更被赋予了隐逸的象征意义和长寿的民俗意义。在唐代，文人们结合自身遭遇，或借菊花表达仕途不顺、人生失意，或借菊花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在宋朝，宋明理学的快速发展对文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文人多注重自己的人格独立，不受黑恶势力侵扰，菊花的隐逸特性便受到文人的重视和发展。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在宋朝高度繁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商人的地位有所提升，经济交易活动更为普遍。在人们基本温饱得到了满足之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花卉产业的繁荣发展也为菊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当一种爱好开始进入产业化的生产种植，菊花文化也在随着时代而发展变化。于此同时，新旧两方的观念产生了冲突，蒲松龄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对菊花文化的看法，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影响力。

“菊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沿着高雅和世俗两个方向发展，其世俗的一面多表现为功利用途。即使是在特别强调人格修养的宋代菊花意象也产生了世俗功利的内涵而且就产生在读书人中间。” ([9], p. 73) 我们可以看到，菊花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单将菊花看作一种植物而言，菊花是没有高雅世俗之分，这些都是后人赋予菊花的。文化本身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菊花文化也如此。蒲松龄主张菊花文化应该是多层次发展，他不应该被人单一地定性，在任何时代都保持一个象征意义。“蒲松龄为传统的菊花意象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为菊花的文化符号进行了重新构建，通过菊精形象肯定了物欲的合理性。” ([9], p. 74) 蒲松龄便将作为高洁本身的菊花化为菊花精，受马才子的爱菊之情所感动，在人间相知相识。又借菊花之口和传统文人观念的马才子进行对话，高雅和世俗的观念在此产生了冲突。在这之中“有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遵从，但他也认同社会价值的流变，对商人地位的提升在作品中给予肯定” ([10], p. 138) 表达了蒲松龄对新时代背景之下的对士商观念和传统君子固穷的观念的看法。

5. 结语

通过对蒲松龄文人情怀和寒士生涯的研究，传统寒士阶层对于美眷、财富、理想的共同追求得以展现。我们了解到菊花在传统文化之中是作为一个高洁坚贞、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的一个文化象征和长寿的民俗象征。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士商观念，高雅世俗观念开始发生了冲突。蒲松龄认为君子不一定固穷，肯定了物欲的合理性，对儒商身份的出现持肯定态度。将传统的独立于世俗之外的菊花拉入世俗之中，将菊花文化看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将不同观念的价值纳入其中，极大丰富了菊花的内涵。

参考文献

- [1] 王无启. 聊斋文集[M]. 上海: 九州书局, 1935.
- [2] 张晓靖. 蒲松龄的寒士际遇与《聊斋志异》中的寒士画像[D]: [硕士学位论文]. 青岛: 青岛大学, 2005.
- [3] 齐璐雅. 清初小说家的生存境遇与著书心态——以王士禛、李渔、蒲松龄为中心[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宁: 曲阜师范大学, 2020.
- [4] 支利峰. 浅析陶三郎形象——以《聊斋志异·黄英》篇为例[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5(S1): 49-51.
- [5] 陈文新. 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6] 释学山. 浅谈孔子的“学习之道” [J]. 南方论刊, 2013(2): 50-52.
- [7] 杨树达. 论语疏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8] 朱荣梅. 解读《聊斋·黄英》人物形象的思想文化意蕴——兼论蒲松龄与儒道墨思想[J]. 蒲松龄研究, 2020(4): 71-76.
- [9] 张荣东. 中国古代菊花文化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 [10] 赵海霞. 论蒲松龄的儒者情怀——以小说《聊斋志异·黄英》为中心的考察[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9(6): 138-141+144.